

►教育时论

以全方位合作打造高水平高校联盟

董秀华

据《新京报》报道,11月22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由北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组成的北京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第二届理事会举行。会上,《北京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北斗星链”内涵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正式发布,明确未来三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实现沙河高教园区高校间多方互补、互助共赢,为建设世界一流科教融合产业新城贡献力量。

高校联盟建设与发展由来已久。在我国,近二三十年来,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高校联盟也是接踵而至。例如同类型高校的联盟,有9所首批“985工程”高校成立的C9联盟、9所理工科见长的高校成立的E9联盟、被称为“国防七子”的7所学校成立的G7联盟、中西部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大学(Z14)联盟等。区域性的高校联盟,有武汉七校联盟、中山大学牵头成立的粤港澳高校联盟、浙江大学领衔发起的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等。

总体来看,同类型高校间缔结的联盟,大多有着相似的发展基础和历史渊源,相互间更多的是平等协作的关系。而区域性的高校联盟,异质程度相对较高,更多的是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型的发展格局。无论是哪种性质的高校联盟,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责任担当或发展诉求,或为了优质资源互补,培养

复合型人才,或为了形成合力以提升实力,更好地服务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

综观不同高校联盟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态势,有些高校联盟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虽说大多数高校联盟成立时都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但其中不少仅开过一两次会议之后就慢慢没了动静。究其原因,多是由于联盟缺乏长期规划引领和共识度的目标愿景,发展内驱力欠缺,或者是因为联盟运行的制度、资金、组织等保障力度不足,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的、合同化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高校联盟的秘书处、办公室等事务性协调和落实机构,基本上都是非实体性运行,负责人一旦调离就很容易中断相关工作,造成联盟关系松散、脆弱、不稳定。种种原因,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些联盟没能真正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热闹几年后渐渐归于沉寂。

鉴于高校联盟正日益成为高校际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机制,共同探索联盟高校间的实质性合作,以充分发挥“1+1>2”的协同效应,理应为促进高校联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诉求。为此,高校联盟需在合作的精度、广度、深度上综合考量,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和行动。

高校联盟发展需适度聚焦合作的议题和领域,确保校际间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已有实践表明,校际间全方位合作性质的联盟往往因为顾及面较大、协调点太高、关注点相对宏观等,容易造成精力和资源

都相对分散,不能很好地解决学校发展中急需突破的实际问题。为此,建议联盟学校围绕某些相对具体的领域或相对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如实验设施设备的共享、跨学科领域的发展、重大研究议题的协同等事项,相对聚焦,开展实质性合作,将工作落到实处,在充分磨合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合作议题和领域范围,以谋长远。

高校联盟发展需适度控制成员数量规模,促进联盟成员的相对稳定与动态开放相结合。无论是何种类型、何种性质、何种方式的高校联盟,其根本宗旨都是实现成员高校的互利、互惠、共赢。无论是基于沟通成本的角度,还是管理效能的维度,保持适度规模才能确保成员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资源共享相对有效。而保持入盟标准的相对一致性和入盟机会的适度开放,有利于形成联盟成员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应适度区分松散型联盟成员和紧密型联盟成员,并处理好其间的关系,给予更多高校加入联盟、促进发展的机会。

高校联盟发展需有更高站位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以切实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实力为己任。高校联盟除了为成员高校谋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政策红利外,还要有更高站位的责任担当。一方面,要更加主动地加强与政府部门、兄弟高校等的交流沟通,为政策发展完善提供联盟层面的经验和建设;另一方面,高校联盟不能都是门当户对的同质结合,还要考虑通过联盟发

挥引领和援助作用,实现大手拉小手,促进不同生态位的高校进行强强合作,从而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使高校间的协同发展产生更加显著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更新迭代的当下,技术将为高校联盟跨越时空的发展打开新的无限可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切实推动高等教育要素在校际间的自由流动,打通和争取更多社会资源,整体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实力,应该成为高校联盟发展的更高追求。

高校联盟需有意识地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参与国际教育治理探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中非大学联盟、中阿大学联盟等应运而生。不断拓展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规模与质量,尤其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是增强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的关键要素。为此,高校联盟需更加有意识地增强国际交流合作的意识和能力,立足联盟高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拓展中外高校的友好交往与教学科研合作,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探索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可能路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研究员)

►微言

提升急救素养 护佑学生生命安全

曹灿辉

身体前倾、双臂环抱、握拳用虎口击打上腹部……不到一分钟,北京市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小谢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让弟弟顺利吐出了卡在喉咙里的糖果,这一切得益于她在学校急救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名单,北京有30所学校入选。在北京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急救教育这堂“救命课”的重要性。

生命只有一次,但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掌握急救知识技能可以自救、互救。以心肺复苏为例,当患者出现心脏骤停,一分钟内得到有效的心肺复苏,90%的患者可以救活;4分钟内得到有效的心肺复苏,50%的患者可以救活。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急救知识技能普及率仅1%左右,而发达国家该数据为30%—40%。对此,有专家呼吁在全社会普及急救培训,各级各类学校应做好学生急救教育。

学校开展急救教育,提升师生急救素养,守护学生生命安全,具有深远意义。《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开展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容,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纳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学段课程;小学阶段的急救教育主要在于普及急救电话拨打、求救和简单的外伤包扎等;初高中阶段则重点普及心肺复苏术和常见的溺水、触电、窒息等急救知识。

三要注重形式求实效。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急救教育校本课程,开展相关教育教学活动,力求与各学科教学有效融合。可利用课本剧、演讲、写作征文、摄影、剪纸、体育运动竞赛等形式,开展急救教育主题活动。同时,可尝试采取歌曲传唱、快板等形式,让学生掌握技能、受益终身。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工作人员)

院士跑马拉松 具有榜样示范意义

胡欣红

简单的背心,胸口印有“西湖大学”,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参加跑赛时的常见装扮。11月26日进行的上海马拉松赛场上,施一公再次以这样的装扮冲过终点线。56岁的他成功跑进4小时,以不错的成绩完赛。

全程马拉松不是一般人能跑的,需要长期坚持。参加全程马拉松比赛的,大多是业余时间相对宽松的人。在许多人眼中,施一公的身上有很多标签,如科学家、教育家、创业者,但很少有人想到施一公竟然是一位资深跑者。其实,施一公并没有所谓的运动天赋。他初三时意外报名校运会1500米长跑,结果跑了倒数第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讨厌跑步,反而努力练习。1985年入学清华大学时,施一公还在3000米竞走比赛收获第一名,创下清华大学校运会竞走项目的纪录。

生命在于运动。从1500米倒数第一到3000米竞走冠军,让施一公深刻体会到跑步的快乐和好处举不胜举,也向世人证明动起来并不需要特别的条件。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保证有充沛的体能投入工作,也是对于意志力的锻炼。尤其是马拉松,更是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过程,这也是很多人迷上马拉松的深层原因。

“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与施一公相比,一些大学生不爱运动、怕运动乃至基本不运动让人唏嘘不已。近日,新华社对高校大学生身体素质进行了调查,很多男生连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深深刺痛了公众眼珠。

56岁的施一公院士跑马拉松,生动地展示了长期坚持锻

炼对个体身体素质的影响,给大学生们上了一堂运动示范课。他以身体力行的姿态,证明了无论是年龄还是工作忙碌程度,都不是健身路上的拦路虎。

不愿“动起来”的大学生固然需要深刻反思,此事对于高校管理者也有启迪意义。近年来,增强大学生体质已引起很多高校的高度重视:有的高校出台增加体育必修课课时和学分政策,有的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有的用“半价早餐”吸引学生早起,有的专门设立“健康奖学金”……这些举措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依然有改进的空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大学生应该很清楚,之所以动不起来,很多时候缺的可能就是来自身边的有效激励。如果高校教师群体中多一些身体达人,何愁不能带动学生养成良好运动习惯?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已经有高校管理者在体育运动方面进行了言传身教,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今年9月2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在给本学年新生上课时,为了鼓励学生放下手机走出宿舍,59岁的舒书记现场给学生来了40个花式俯卧撑表演,赢得一片喝彩。据悉,受这一即兴表演的启发,该校不少师生加入了挑战花式俯卧撑的行列,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很火爆。

体育锻炼的背后是自强不息精神,可以让人一生受益。期待更多的高校教师能像施一公院士和舒歌群书记这样充分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激励更多的大学生积极运动、热爱生活。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焦点时评

培养德法兼修的卓越公安法治人才

王雅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要着力培养和培养卓越公安法治人才。公安教育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院校是培养卓越公安法治人才的第一阵地。要进一步发挥公安院校培养德法兼修的卓越公安法治人才的阵地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支持和保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培养卓越公安法治人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首先,这是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公安身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重职能,承担着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任,是国家治理机关。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公安执法方面的要求已不仅是形式意义上的严格执法,还要追求执法的精准化、文明化、人性化,并最终实现良法善治的法治目标。这既指明了公安法治人才的培养方向,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其次,这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从职能分工来看,公安机关一方面通过依法防范和惩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化解矛

盾纠纷,实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安全职能的行使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公安执法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能力。再其次,这是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的重要方面。2018年,教育部与中央政法委联合发文,就进一步实施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2.0提出了具体意见,为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法治人才是公安政法司法的中坚力量,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养成法治思维及法治实践能力,在推动依法行政、严格规范执法、推进公正司法、建设法治社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公安院校承担着培养新时代卓越公安法治人才的重任。不同于一般高校,公安院校注重政治忠诚教育,且力求将法学教育与警察职业教育相结合,必然在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具备自身特点。总体而言,公安院校培养的卓越法治人才需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一是政治素质卓越。公安院校始终坚持政治建校的办学方针和方向,以培养“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首要政治任务,人才培养要超越一般院校的政治素质要求。公安卓越法治人才的培育,首先是政治素质卓越,要牢固树立其“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二是专业知识卓越。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形势愈加复杂多变,公安执

法面临的法律问题也呈现复杂化、综合化、精细化的特点。这要求卓越公安法治人才必须提高法治素养,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基础。三是应用能力卓越。公安院校是培养基层执法人员的重要阵地。与其他普通高校相比,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培养卓越公安法治人才应以公安工作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学生的警务实战能力,使其在公安工作中能有效应对各种复杂问题。四是道德情怀卓越。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机械地依法办事,可能导致法治精神与核心价值脱轨,从而无法实现善治的目标。因此,卓越公安法治人才除了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外,还需具备道德等法外价值情怀,并根植尊崇实质正义的信仰理念,在执法过程中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为达成卓越公安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公安院校应结合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创新课程体系,实施具备公安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路径。一是以“四个卓越”为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应在规定的法学人才培养共性标准之上,构建符合公安特色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在培养目标上,要突出“过硬的政治品格”“严明的纪律作风”“良好的法律素养”“扎实的警务技能”要素;在课程设置上,通过入学教育、军事理论教育、劳动教育等通识及实践课程,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和纪律意识。二是以人

才产出为导向,构建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对标院校所在的行政区域情况及公安执法现状,以公安各警种的人才精准需求为导向,促进法学、公安学、公安技术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构建契合公安机关职能岗位需求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实现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公安法治人才的高质量培养目标。三是以协同育人模式,完善应用型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依托校局合作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学校和公安实务部门双向交流,构建集专业教师与实训教官为一体的“双师型”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同时,可邀请公安机关、检察院、司法局以及人民法院等部门的实务专家深度参与教材编写、专业教学、集体备课等育人环节,以充分发挥法治实务部门在公安院校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中的协同作用。四是以信息赋能为手段,完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建立健全体现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特色的信息化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用大数据直观反映教学质量,优化教学实训考核评价体系,形成科学的教育培养质量管控机制。同时,搭建就业追踪信息平台,定时就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以及用人单位满意度进行调查,及时获取用人单位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反馈意见,使公安院校人才培养不断适应公安工作的新要求。

(作者系河南警察学院法律系副主任)

善用技术手段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王轶晰

近日,教育部在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8081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出,将“研制《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指南》,进一步明确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工作要求,强化活动课程资源统筹和整体设计,规范引进校外资源,利用信息化赋能质量提升”。客观来看,在过程管理、资源供应、新技术赋能质量提升等方面,中小学课后服务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进一步明确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工作要求。在“双减”落地的两年内,大部分地区在规范课后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明确并落实了课后服务的时间、主要活动内容、人员配备、教师参与补贴等。在此基础上,课后服务工作的过程管理要进一步走深走实,可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学校的指导、健全相应机制等,使课后服务更加规范。例如,在遴选第三方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时,可在综合考察机构的资质、营运情况、安全保障、服务质量等基础上,建立课后服务机构的黑白名单制度。在财务监管方面,应按照不同活动项目、不同软硬件设施的要求,明确细化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指导学校建立健全学校

代收费和退费财务机制。在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方面,应加强对学校的指导工作,探索完善课后服务的评价机制,不仅要考核教师是否参与组织、实施课后服务,也要基于课后服务是否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否做到规范管理、能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否使学生的家长满意等,全面衡量学校课后服务的育人质量,以此引导学校做好课后服务的资源供给和质量提升工作。

进一步拓宽课后服务供应渠道。当前,学校引进第三方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活动已在部分地区不断推进。课后服务供给不应仅依靠校内教师和校外第三方机构,也应吸引学校所在社区、科技馆、博物馆等公共事业资源以及家长志愿者、退休教师等多方参与。例如,一些学校与周边养老院、博物馆、消防站等建立合作关系,组织学生在课后服务时间内进行劳动教育和研究性学习,引导学生走进这些公共事业机构,进行实践学习和职业体验等活动。一些学校与所在社区的党支部、党建园等合作,在课后服务时间内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有一些学校邀请退休教师和家长志愿者走进校园,通过家长导读、讲座

等形式,拓宽学业辅导和兴趣拓展等方面的资源渠道。这些尝试开拓了学生视野,提升了课后服务质量,但同样也存在规范性和系统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常态化难度较大等问题。对此,学校有必要细化相关方案和制度,解决学生外出或在参加此类活动时人身安全如何保障、学校教师如何配备、与外部人员如何分工、财务与后勤制度如何支持等具体问题。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加强指导和监管,充分了解学校进行此类活动的背景和实施方案,指导学校对活动予以有效管理,切实提升活动质量。

探索数字技术赋能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新方法。信息技术为课后服务提供了资源渠道。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集了大量优质的课后服务资源,包括科普教育、体育锻炼、文化艺术、经典阅读等相关内容,为学校设计有趣的课后服务活动提供了帮助。各地也陆续上线了各具特色的教育资源,如北京的数字德育、上海的科普科创、浙江的劳动实践等。此外,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读书平台、树人课堂等,也为学校和区域组织开展课后服务活动提供了支

撑。区域和学校可通过典型案例推广、集体设计备课、集体教研等方式,使教师充分开发这些资源在课后服务中的应用场景,拓宽课后服务渠道,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一些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可通过双师课堂、课后服务实施效果在线评估。借助信息技术,也可以动态了解中小学课后服务的供应渠道、实施情况,及时发现

问题,作出科学决策,提升课后服务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学校购买或引进这些资源时,需要针对设备和资源合理使用、数据安全、师生个人信息保护等加强监管。信息技术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也可以动态了解中小学课后服务的供应渠道、实施情况,及时发现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